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

辛 平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

辛 平 编

太田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

辛 平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4 印张 28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605-025-6/G·011

定价:9.80 元

赘言

打算写一本论述“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小册子，还是数年前我在全国政协做编辑工作时的一个想法，那时我一方面注意编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一方面注意收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时日一长也便积累了一大包。但是，由于突然转业，我以为日后对统战问题要洗手不干了，所以将那一大包材料随意弃之一旁，谁想这一轻率竟成了我的一大憾事——因为明年便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有心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没有比重操旧业更得心应手了。当我准备动手时，那包材料已杳若黄鹤，任凭我如何翻箱倒柜，也于事无补，一种无名的沮丧侵蚀着心头。我没有任何理由埋怨他人，只有默默地怨恨自己。

著书立说的人都清楚，材料积累是基础工程，脱离了这个基础，何等“高明”的论述都不过是空中阁楼。我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设想，另辟蹊径，于是便产生了这本《毛泽东与党外人士》。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的已有不少，将零散的文章集纳成书的也有几本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多是片断（而且多没有文章出处），少有完整。我编著的这本书，力图完整地表现毛泽东与比较重要的那些党外人士交往的全过程，使人阅读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整体的印象。可以说这就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历史的原

貌，我没有强求文章体例的统一，陈述的一致，所以文章各段落中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又变成第三人称，凡此，均注明了文字的出处，决不致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任何困惑。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有人曾劝我重新编写，这主意不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但这样很容易加入个人的理解，伤害了原作者的本意，我以为仍维持原来的设想，仅对资料需要重新梳理的个别篇目和章节进行编写，也许更为妥当。编辑此书对我来讲是一次尝试，它的可取之处就是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本书所收的文章，除少数几篇本身已经撰写的比较完整，没有必要再加入其他的资料外，绝大多数文章或以一文为主，加入其他资料，或以多篇混编，或根据有关资料撰写，或采访整理，或请人撰稿，力求使每篇文章都具有启发性、新鲜感和可读性。此外，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在每篇篇首加了那些党外人士的简历。

可以说，我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计划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尽收其中，现在看来，这一努力基本上实现了。但遗憾的是，有几个原列入选收计划的著名人士：如李洛深、马叙伦等，因资料不够完整，只得暂告阙如，俟后另觅机会补救了。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专家和读者对本书批评指正，并提供新的资料。

辛 平

1992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以生年先后为序)

毛泽东与蔡元培	(1)
《伦理学原理》	(2)
毛泽东在北大	(4)
接受马克思主义	(7)
为蔡元培作记录	(9)
“理想相合”	(19)
营救杨开慧	(20)
“你父亲真是好人”	(21)
毛泽东与张澜	(25)
“神交已久”	(26)
“老成谋国”	(29)
“共做努力”	(32)
真知卓见	(34)
毛泽东与陈嘉庚	(38)
延安一席谈	(39)
“华侨旗帜”	(44)
“谨请命驾北来”	(45)
亲自过问陈嘉庚的安全	(47)
毛泽东与黄炎培	(49)

听众中竟有一位盖世英雄	(50)
一则谣传引出的故事	(50)
“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	(52)
《延安归来》	(55)
“天安国庆逢佳节”	(56)
“是做事，不是做官”	(58)
向资产阶级宣传社会主义	(62)
《东方红》已遍环瀛	(66)
毛泽东与仇鳌	(70)
望命知遇	(70)
电邀赴京	(73)
难得诤友	(76)
重偕花烛	(77)
亲密往来	(79)
毛泽东与鲁迅	(82)
两个半懂得中国的人	(83)
“山大王”的气概	(85)
这才是实际的鲁迅	(86)
“我作为一名小兵还是胜任的”	(87)
关于“阿Q”	(90)
说得好！说得好！	(92)
评价最高的人	(94)
毛泽东与程潜	(97)
亲迎故人	(98)
共游天坛	(101)
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名中央委员	(104)

“道大为公天可则”	(105)
毛泽东与章士钊	(110)
1957 年, 诚恳地发言	(111)
毛主席的评价	(112)
“还债十年”	(115)
1966 年, 给毛主席写信	(117)
《柳文指要》的出版经过	(123)
为国共再次合作奔走	(127)
毛泽东与李鼎铭	(129)
“精兵简政”	(129)
“开明人士”	(132)
民主合作	(134)
推动中西医结合	(137)
毛泽东与马寅初	(139)
重逢雾都	(140)
请来“尚方宝剑”	(142)
“新人口论”	(144)
不要搞个人迷信	(148)
毛泽东与张干	(151)
夜不成寐时	(151)
毛泽东重新看张干	(153)
书来信往	(155)
邀请张干赴京	(157)
一份丰厚的“薄物”	(160)
毛泽东与柳亚子	(163)
最早写诗赞颂毛泽东的人	(164)

倾倒山城的《沁园春·雪》	(165)
欢聚北平	(167)
人民伟大! 包括你, 也包括我	(168)
诗友唱和	(173)
大儿斯大林, 小儿毛泽东	(175)
毛泽东与李宗仁	(178)
破碎的和谈之梦	(179)
艰难的归根之路	(184)
第一次握手	(187)
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188)
临终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190)
毛泽东与张治中	(192)
三到延安	(193)
“我们欢迎”	(197)
真诚合作	(202)
同行者还有张治中	(204)
最后一次进谏	(207)
毛泽东与许德珩	(208)
在北大的日子里	(209)
火腿、怀表和布鞋	(210)
山城重聚快何如	(211)
九三学社不能解散	(213)
毛泽东与宋庆龄	(217)
“国母”亲访毛泽东	(218)
“敬希命驾莅平”	(221)
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大业	(223)

“亲爱的大姐”	(226)
暂时留在党外作用更大	(229)
《追念毛主席》	(230)
毛泽东与续范亭	(233)
为报急情赴延安	(234)
今日先用急火煮	(238)
领袖群伦不自高	(242)
奇文一篇振人心	(245)
心悦诚服毛泽东	(246)
毛泽东与梁漱溟	(250)
北京初识	(251)
窑洞里的争论	(252)
畅所欲言	(255)
中南海的座上宾	(257)
一场争论的始末	(262)
附：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	(276)
毛泽东与邓宝珊	(290)
我们一定能合作的更好	(291)
稳住三边	(295)
最融洽的一次会见	(297)
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进步人士	(299)
痛苦抉择	(304)
回“娘家”	(307)
友情常在	(310)
毛泽东与傅作义	(312)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	(313)

绥远方式	(319)
该奖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324)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	(326)
毛泽东与卫立煌	(328)
取道延安会见毛泽东	(329)
曲折的归来之路	(335)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340)
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342)
毛泽东与周世钊	(346)
长岛人歌动地诗	(346)
品学兼优的同窗好友	(347)
修业小学的同事	(348)
为将来合力做一点准备工夫	(350)
九州明月系离肠	(351)
《过许昌》与《水调歌头》	(352)
难忘的一天	(353)
“我看你这个人可以兼的”	(359)
“庙可以重修嘛!”	(360)
上书毛主席	(361)
并非多余的话	(363)
附：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之谜	(365)
毛泽东与周谷城	(377)
“一师”同事	(377)
参加“全国农协”	(378)
“没有人怪你”	(380)
真理被接受要有一个过程	(381)

不要害怕辩论	(383)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	(385)
郊外别墅吟诗	(388)
毛泽东与陈明仁	(390)
一张双人半身照	(391)
“我现在真正服了共产党”	(393)
分赠照片	(345)
毛泽东与萧军	(395)
意外的会见	(399)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40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开炮	(407)
萧军的作品可以出版	(411)
毛泽东与班禅	(414)
11岁活佛作出惊人决定	(415)
“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	(418)
“你们是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422)
勇上“七万言书”	(425)

毛泽东与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字鹤卿，号鹤顾，改字仲申，号孺民，以号行世。早年由秀才、举人、进士而入仕途。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后，开始关注西学，留意世界新知。1898年变法维新失败后，弃官入教育界，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1902年创办中国教育会，任会长，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回国，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南北议和后辞职。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整饬校风，兴利革弊，任新汰劣，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存，开一代新风。五四运动时，虽然支持了师生的爱国行动，但推崇的却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所以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积极给以支持。此后，历任大学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故辞去他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发展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在此期间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有了较深的认识。1932年12月，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结社、

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斗争。1933年3月14日，在上海发起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指出：“马克思之为一伟大之思想家……今以反对共产党之故，遂及于马克思之思想与学说，则为盲目，为思想上之义和团。”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1938年4月，与共产党人吴玉章晤谈时，蔡表示“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1940年3月5日不幸病逝于香港。

《伦理学原理》

研究蔡元培与毛泽东的关系，应先从蔡元培同杨昌济的关系说起。

杨昌济，号怀中，湖南长沙板仓冲人。中秀才后，在乡间教书。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杨即开始和蔡联系。次年，杨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后往英国，入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学成后，又去德国考察。

杨昌济在苏格兰时，其族孙杨笃生、同乡章士钊均在该处。此时，蔡元培亦在德国攻读。杨笃生是蔡试制炸弹共图革命时的战友，章士钊是蔡主持的爱国学社的学生；同时，蔡元培与杨昌济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同在西欧，交流较便。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两人交往颇多，友情日进。

辛亥革命后，杨昌济归国，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特别赏识毛泽东，常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毛泽东也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

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哲学等课程，极力推介蔡元培的译著，并把蔡所译的《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原著）定为教科书。毛泽东回忆说：“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精读了这本蔡译《伦理学原理》，对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这本书所有的空白处，他写了150多条批注，有表示赞成的，如“旨哉言乎”、“此说与吾大合”等；有表示反对的，如“此节不甚当”、“不应以此立说”等；有表示怀疑的，如“此却有一疑问”等。他还根据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梁启超等人的学说，加以比较、综合，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段。批注的墨迹，有两种以至三种的，有些是对以前所写批注重加批判或补充。为能充分发挥，有的批注长达800多字。原书不过12万字，而他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竟约达1万2千字。

仅举两条批注为例，可见一斑。

在该书106页第四章第一段上，原文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他写的批注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在该书183页第二节第十段上，原文为“人既信善之有

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他写的批注是：“<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毛泽东在北大

1918年春，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伦理学的教授，举家迁居首都。

同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及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他于八月间到达北京。他回忆说：北京“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杨昌济“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对此，蒋梦麟有一段追述：“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大钊到校长室，为毛找工作，“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蒋梦麟这段话，记忆有误。毛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9月，蒋尚未进北大。蒋第一次代理校长，自1919年7月中至9月中为止，此时毛已回到长沙。这就是说，毛任职北大，是在蔡元培自己主持校务期间。按惯例，大致是，杨昌济向李大钊介绍，由李以图书馆主任职位向校长提出，再由蔡元培写派任的条子，通知校会计课照发月薪。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工作虽然琐碎，待遇虽然菲薄，但他充分利用这一极好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得以和李大钊朝夕相处。李因章士钊的推介，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加聘为教授，随后，又聘为校长室秘书。李搜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自己努力钻研，广泛向人传播。李很器重毛，认为毛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而毛也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如毛后来的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利用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经常旁听北大各种课程，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在成立会演说词中，提出两个目的：一是“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二是“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919年2月19日，又举行改组大会，到会员毛泽东、徐恭典等二十六人，蔡元培亲临演说，并被选为会长。

该研究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课程，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毛泽东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该研究会于1919年10月16日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听讲一年的证书。蔡元培在期